

# 多维视野中的十月革命与俄罗斯命运

——“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张桂芳 郭琳

2017年5月20日至2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俄罗斯哲学专业委员会主办,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的“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十六届全国俄罗斯哲学学会年会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召开。来自国内外30余所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4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入讨论。会议主要就“十月革命与苏俄哲学研究”、“欧亚主义哲学与‘十月革命’”、“俄国知识分子及民族命运”等问题进行了分阶段讨论。

## 一、十月革命与苏俄哲学

中外与会学者从哲学、政治学、语言学等不同学科立场与视角出发,就“十月革命的再认识”、“苏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极具学术价值的讨论,为跨学科的互动研究搭建起学术平台。

第一,俄国十月革命是人类20世纪伟大的实践。对此观点,与会学者达成了共识。十月革命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但十月革命不是完全孤立的政治事件,从不同学科的视角来研究十月革命,能够引发人们对十月革命的再认识。十月革命的背景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大势趋同,与习近平提出的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

标一致,也与俄罗斯哲学家长期以来孜孜以求、不断探索的主题相契合。

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所长布洛夫院士介绍了俄罗斯主流思想对十月革命的评价,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俄罗斯的研究现状。海南师范大学陈红梳理了俄罗斯右翼主义者、左翼主义者,以及俄罗斯政府关于十月革命的不同评价,认为必须结合具体的历史事实和人心向背,才能对十月革命形成正确的认知。上海社会科学院郭丽双梳理了十月革命100年来,俄罗斯学界和政界对十月革命的多重评价,指出必须突破传统评价中“两个神话”的思维框架,回到历史中去,对十月革命进行再认识。首都师范大学林精华分析了俄国人、欧美人和中国人对于十月革命及其新政权的不同认知。

中国人民大学安启念认为,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关系密切。一方面,十月革命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实际的结合,是俄罗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无论从政治、历史、经济或文化条件上来看,俄罗斯必须探索一条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十月革命是俄罗斯哲学发展的标志。不了解俄罗斯哲学就无法了解俄罗斯历史,俄罗斯民族的特征关乎全人类的命运。从十月革命到苏联解体,苏俄的实践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紧密交织。

中国人民大学张新从政治学的角度出发,对如何评价列宁关于十月革命的评价进行了

作者:张桂芳,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郭琳,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

反思,因为对十月革命的评价直接影响到对中国社会主义的评价。他认为,十月革命的胜利证实了列宁“一国胜利论”的正确性,列宁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一国建成论”,却有了这种思想的萌芽,但列宁关于国家建设的构想存在一定的消极性,低估了社会主义长期建设的复杂性。

第二,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Nicolas Berdyaev)关于俄罗斯革命的看法,受到普遍关注。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切尔尼亚耶夫教授指出,别尔嘉耶夫有别于其他的宗教哲学家,他对俄罗斯革命的态度经历了变化,由早期的批判态度发展到后来的保卫态度,并对俄罗斯革命进行了形而上学的分析,认为俄罗斯革命的力量源于精神,而非政治。别尔嘉耶夫一生都不曾放弃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美学、宗教美学共同促进了俄罗斯宗教哲学的复兴,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对俄罗斯革命进行了剖析。别尔嘉耶夫预言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也预言了苏联体制最终会失败瓦解。黑龙江大学周来顺指出,自19世纪中后期开始,俄国学界普遍开始关注俄国历史命运的问题。别尔嘉耶夫认为十月革命爆发的必然性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俄国下层民众命运悲惨,预示着革命的到来;其次,列宁作为伟大的革命领袖,具有极大的人格魅力和民众号召力;再次,俄国文化中平均主义思想使之与第三国际的革命对接成为可能。周来顺通过阐释别尔嘉耶夫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别,勾勒出别尔嘉耶夫历史哲学理论研究的新方向。上海大学高海英认为俄罗斯哲学与文学浑然一体,从文学视角考察别尔嘉耶夫的革命理论将有别于19世纪的哲学角度。文学界通过对别尔嘉耶夫生平传记的研究,揭示了别尔嘉耶夫所谓“革命”并非政治意义上对掌权的渴望,真正的革命是精神上的反抗,是对自由价值的追求。

第三,重视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

究。作为苏俄哲学研究领域内的方向之一,苏联自然哲学问题研究,在本次大会上引起了国内学界的重视。清华大学鲍鸥以苏联哲学家、科学史家、科学学家凯德洛夫为例,指出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既顺应苏联的意识形态,又存在张力。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观,以科学案例为基础,关注科学技术的现实问题,强调理性与统一性的同时,还强调感性与个性,强调科学研究创造过程中人所发挥的主体作用。

第四,关注俄罗斯语言哲学的发展。十月革命以来,俄罗斯语言哲学在各个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特色,在政治壁垒中暗流涌动。20世纪西方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在语言上,颠覆了传统的语言哲学观念。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萧净宇从语言学、语义学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十月革命以来俄罗斯语言哲学发展的特点,将之归结为在夹缝中生存和发展。俄国形式主义流派始于20世纪初,源于彼得堡诗歌研究会和莫斯科语言学研究小组,其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对现象学的发展,不仅把对话领域应用到语言领域,并使之上升为人文主义研究的基础,其中以俄罗斯语言哲学家洛特曼的影响为最大。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语言哲学的新气象表现为与西方接轨,并将之推向新的高峰。

## 二、十月革命与欧亚主义

欧亚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的关系成为本次会议中俄两国学者关注的热点。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所长斯米尔诺夫院士提出,俄罗斯有自己的文化发展逻辑,该逻辑符合俄罗斯民族的世界观。西方哲学按西方人的逻辑,只关注哲学中最核心的内容,却将俄罗斯及其他所谓“边缘地带”的哲学割裂在外。但各民族都不会放弃追求哲学的权利,每个民族都有自身的哲学发展逻辑,欧亚主义哲学便是如此。斯米尔诺夫院士从“聚合性”、“和谐”、“共

同事”三个范畴出发,具体阐释了欧亚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差异。

莫斯科国立大学旺邱科夫教授从古典欧亚主义立场出发,探究十月革命与国家转型的问题,介绍了由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提出的新术语“俄罗斯革命”,重点透过“革命”和“布尔什维克”这两个术语,分析了欧亚主义所具有的反西方特征。欧亚主义的政治任务非常复杂,一方面要搞清楚什么是西方文明,另一方面要搞清楚西方主义移植到苏俄后会产生哪些变化。古典欧亚主义者已经认识到了布尔什维克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共产主义者是坚持一套独特理念的理想主义者,布尔什维克则是在接受共产主义理念的基础上,强调如何在现实中实现这些理念的实践家。欧亚主义者把共产主义划分为理论派与实践派,布尔什维克无疑属于后者,实现了东方历史的使命。十月革命与法国革命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法国革命仅局限于欧洲,十月革命则是利用法国革命的思想,把革命的范围扩大到了东方,反映了人民大众的利益,欧亚主义者由此实现了西方概念中“核心”与“边缘”哲学的位置对调。

上海外国语大学那传林和黑龙江大学杜宇鹏分别从不同视角考察了欧亚主义学派对十月革命的评价。那传林从一元政治观、历史价值观、文明价值观、俄罗斯传统宗教观四个维度着手,以“俄罗斯世界”这个概念为线索,把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国家认同与意识形态的问题带入学界视野。杜宇鹏认为欧亚主义从纯学术领域转入政治领域,欧亚主义者对十月革命性质的分析很有意义,新欧亚主义者更是将普京政策与欧亚主义结合在一起。中国社会科学院祖春明分析了欧亚主义中的“亚洲意识”,指出其缘起与15世纪拜占庭继承“双头鹰”国徽有关,在历史上,俄罗斯本身就是蒙古帝国的中心。

燕山大学万长松提出,苏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绕不过去的大山,今天我们所讨论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仅仅是苏俄哲学的一个流派而已。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张变革也呼吁学界应当辩证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能高估也不能贬低,更不能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狭义的俄罗斯哲学终将被抛弃。对马克思主义的贬低和谩骂只会对俄罗斯民族造成不好的影响,缺乏传统的任何创新都不可能实现,这也是100年来苏俄哲学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潘宁剖析了列宁人民主体思想的理论逻辑与现实启示,从多个角度对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进行了历史考察,指出苏联解体的历史原因与经验教训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周杰认为,我们应当反思而不是一味批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吸取苏联模式的教训,并将苏联模式对当代中国政治的启示归结为以下三点:第一,反思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第二,惩治腐败从严治党;第三,警惕西方价值观的渗透。

与会学者还进一步探讨了欧亚主义哲学的贡献。斯米尔诺夫院士认为,欧亚主义者提出了具体的建设国家的方案,主要包括三方面:第一,在政治领域要有主导思想,即欧亚主义思想;第二,在经济领域要将斯大林模式与反斯大林模式两相结合;第三,欧亚主义者在乡土派和土壤派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欧亚主义的科学理念,并提出了语言联盟的概念。因而,欧亚主义的贡献不仅在于哲学理论,更在于在实践中推行欧亚主义的国家理念。

### 三、俄国知识分子及民族命运

俄国知识分子及俄罗斯民族命运的研究,是本次研讨会关注的又一热点。北京大学徐凤林以近代西方的人权和法治思想为标准,批判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法治意识的不完善,论证了启蒙主义法治思想与俄罗斯传统法律意识的对立,认为俄罗斯知识分子对法律与革

命关系的认知不足,导致了他们没有公开承认在法治国家中政治妥协的必要性。不仅如此,在对法律的定位问题上,俄罗斯知识分子对法律的忽视及对法律价值的漠视,使其不可能形成牢固的法律意识。徐凤林剖析了俄国知识分子法治意识缺乏的三层原因:第一,俄国的大众文化包含了不尊重法律的传统;第二,俄国传统法律文化不发达,道德界限模糊不清;第三,俄国知识分子思想中固有的民族意识和社会政治理想主义。

苏州大学车玉玲通过分析阿里斯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瑟尔叶森等俄罗斯知识分子话语体系中的继承性,考察了俄罗斯哲学中反“启蒙”与现代性的内在悖论。

另外,与会学者普遍认识到反映俄国知识分子思想的《路标》系列丛书的重要性。《路标》丛书目前已出版40卷,囊括了苏俄哲学发展史上诸多著名哲学家的著述。斯米尔诺夫院士指出,苏俄哲学的成就与特点与西方哲学不同,今天俄罗斯哲学由不同流派构成,呈现出多层次、多方面、多领域的特征,但其研究关注的热点与100年前一样,仍然以关注俄罗斯民族命运为使命。俄罗斯哲学家最关心的还是俄罗斯民主的定位,但该问题并非俄罗斯所特有,当今中国同样也在思考国家民主和制度建设问题。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谢尔比年科教授通过《路标》系列丛书分析了俄罗斯哲学与

意识形态的动机因素,提出了不能仅局限于历史的观点去评价《路标》丛书的价值,不能简单地用列宁的观点去评价俄罗斯哲学。我们应当认识到,俄罗斯哲学家和思想家会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哲学家的人格与个性自由,这才是《路标》丛书真正的内在动机。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马寅卯以托尔斯泰为切入点,介绍了《路标》系列丛书的价值,剖析了俄国知识分子传统观念中轻视法律的深层原因,进而提出,像托尔斯泰这样的俄国大思想家之所以忽视法律,是因为他们认为法律所提供的惩罚与暴力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此外,基督教圣经以及中国传统思想中关于“爱”的观念被俄国知识分子视为法律的替代。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值此十月革命100周年之际,探讨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不仅勾勒出中俄学者的多传统视野,更体现出多学科、跨领域的深度交流,进一步加深了国内学界对俄国十月革命的理解,为深入广泛地推进中国的俄罗斯哲学研究搭建了一个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也为未来的国际学术研究合作开拓了道路。

责任编辑:澄宇